

- 王大路(小说) 6版
- 废话比赛(小说) 6版
- 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 8版
- 江晓天致李茹的两封信 8版

新作品

杨绛

遥远的春节

□季红真

的图案。就是年过完了，母亲也会把灯笼挂起来，点缀简陋的家。

除了丰盛的年夜饭，我家的春节大概过得要算简单的。院子里的当地人，不上班的主妇们，腊八时，就用醋泡好了蒜瓣，准备初一吃饺子。有的人家把蒜瓣用细竹篾子穿起来，盘在存水的大盘里，蒜芽儿发起来，一盘嫩绿十分喜人，三十晚上，剪下来和肉一起包饺子。把通红的圆萝卜切薄片，挖出里面的肉，盘上蒜瓣，或者放入一棵白菜根，菜芽会发成一棵鲜嫩的小白菜。用绳子穿好挂起来，红是红绿是绿，成为赏心悦目的清供。腊八蒜也从心里往外透着绿，这简直就是春的信息。

守岁是春节从古到今最恒常的内容，而我们家的孩子从来守不住岁，一个比一个能睡。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除了玩一会儿扑克牌以外，很快就东倒西歪地进入了乌有之乡。通常是被母亲唤醒，催促着穿上新衣服，那时候，最高级的衣服是灯芯绒了。然后，一人一碗炒年糕；有的时候，是老家寄来的黄果，是用草木灰泡过的糯米年糕干，用水发开再炒。这也是我们和别家不一样的地方，别家通常是吃饺子。然后，收拾碗筷，把待客的零食摆上，通常是瓜子、花生和水果糖，零食也是在这几天吃得最多，稀罕的是粘牙的糖瓜。拜年的人是走得近的人，彼此相约着挨门挨户地串，除了同事家就是平时为大家服务最多的人。院子里住着一位老校医，平时经常义务为大家打针看病。到他家拜年的人最多，有的时候，大家还凑一点钱，买一幅画，贴上有贺词的红包，送到他家里。有一年，送的是京剧《打金枝》的整幅连环画。下午基本上就没有拜年的人了，和母亲上街，沿途可以看到各种年货摊子，有卖年画的，有卖毽子、泥人一类玩具的，还有卖糖葫芦、冻柿子之类时令果品的。一路走来，被商品的花色艳和得劳累不堪。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小朋友们玩橡皮筋一类游戏了。还有就是听母亲讲闲话，这一天的话题必是老家过年的事情。老家在偏僻的山里，禁忌特别多。过年的时候，不能扫地，怕把财气扫走了；正月初一，不能喝菜汤，否则一年里出门都要遇雨……

成长的过程，是春节的内容不断减少的过程。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破四旧把所有的节日礼俗都扫荡了。家家最大的差别，就是都以红太阳为年画。经济受到制裁，每个人一身的新衣服也免了。没有了拜年一说，桌子上的零食也不必准备了，更不用凑份子送礼。惟一保留的节日，就是年夜饭。母亲仍然殚精竭虑，把这一顿饭做得很像样。这就是母亲的伟大之处，永远以平实的态度对待社会的动荡，尽量维持一手好的饮食水平。吃饭的时候，大家开始用心，因为没有了玩儿的念想。长达10年的岁月，春节的概念就是这阖家团圆的一顿饭。能够凑齐已经不易，有好几年，人都到不齐。有一年，父亲在乡下插队，母亲回老家探亲，兄妹五个人一起张罗年夜饭，竟也摆了一大桌，让来探望的邻居惊异不已。出嫁以后的年就更简单，公公婆婆都是教会学校出身，主的训诫中没有春节一项，过年真正只剩了一顿团圆饭，连年画也免了，打扑克则人手都凑不齐。只是饭后，要包饺子，守岁过凌晨，煮一些充饥，余者冻硬放进冰箱，留作每天的饭食。

最冷清的一个春节，是童年的一次，母亲南归，一向节俭的父亲带着我们过年。所有项目全部削减，连那一顿饭也马马虎虎，那个年好像没过。最丰富的一个春节，是70年代末，父亲平反了，我和弟弟考上了大学，母亲终于从半生的政治阴霾中走出来。团圆饭名副其实，菜肴也格外丰厚，大家都兴高采烈。只是年龄已长，对童年的游戏全无兴致，连放鞭炮也没有人张罗。当时，家在冀西山地，民间节庆的欢乐气氛，从“革命”的恐怖和经济的萧条中复苏，反弹出格外热烈的情绪，村村兴头头地搞活动，而且花样翻新争奇斗巧。和妹妹一起，到附近的村子，看农民穿着花布龙袍，家做布鞋唱大戏，看纸做的狮子耍舞，看走旱船、走高跷。回想起连年饥荒结束以后的1964年，我家当时所在的县里庆丰收，正月里的街上盛况空前，各种秧歌和高跷随着锣鼓徐行小半天。当然，由政府组织动员，比民间自发的要豪华得多，但是没有那里民间的质朴纯粹，带给我的感动记忆至今。现在是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民俗活动在各地都很普遍，适应旅游的需要不按节令。城市里，每天可以看见、扭秧歌，春节的热闹好像被淹没在日常的娱乐中。鞭炮禁止了几年，又有限制地开禁，地方戏萧条了一段时间，又火起来占领了各地舞台。加上各种洋式新式的节日层出不穷，连11月11日都是光棍儿节，数着过都过不过来。春节几乎又只剩下那一顿团圆饭了，而且，就是挂画、放炮竹、打扑克，也都物是人非。和童年相异的是，睡眠少了，年年都能尝到真正的岁末。我多想像童年那样，早早沉入乌有之乡，和隔世的亲人吃一顿饭，哪怕是黄粱一现，马马虎虎也是天大的福气。

哦，遥远的春节！

正月里来正月正

□刘锡诚

“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离开故乡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儿时的许多人物和事情，在记忆中已经模糊不清了，惟独过年的那些事儿，买年画啦，写对联啦，贴门神啦，祭灶王啦，接财神啦，祭祖啦，守岁啦，拜年贺岁啦等等，却还清晰地刻印在脑海里。因为春节对乡亲们来说，不仅是喜悦的、欢乐的，也是神圣的、神秘的。

凡是神秘的事情，尤其是神圣的事情，一旦经历过、体验过，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就说送灶王爷升天的仪式吧。腊月廿三晚上，旧的灶祸被从碗柜边的墙上揭下来，把新买来的灶祸换上去，并把供品——关东糖摆好。家长默默地走到黝黑的天井里，把旧灶祸烧掉，让灶王爷随着火光的升腾回到天上。一边烧，一边念念有词地说：“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嘱咐灶王爷升天不要在玉皇大帝面前说家里的坏话，祈求全家来年平安吉祥。乡俗认为，灶王爷不是神，是家庭的一员，有的灶祸

还一左一右画有两个老婆，但他能通神，是个人神中的人物，而关东糖是可以把他的嘴巴粘住的。祭灶仪式固然简单，可是在我们小孩子的心里，却以为灶王爷真有这样大的本事，全家的祸福，都掌握在灶王爷手里，尽管民间传说里也有不少是奚落他的。

守夜也很有神秘感。除夕晚上，家家户户都要守夜，把大门关闭，上了门门后，天井里要撒上芝麻秸（我们那里俗称撒碎）。芝麻秸干燥，踩上去会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鬼魅邪祟不敢来犯。大人开始坐在屋里守夜，要点长明灯，全家不能大声说话，怕惊动了神灵，屋子里萦绕着一片神秘气氛。熬不住的小孩子要睡觉了，但头要向着喜神或财神来方向。旧时灶祸的上端都印着“喜神东南”或“财神东南”的运势提示。到五更起床时，也要朝着这个方向穿衣，且不准大声说话，以祈求来年好运。儿时所经历的这种神秘的过年氛围，怎么会忘记呢。尽管科学家和政治家可以责难农民被迷信所误，但不要忘了，这是自给自足的农民们的狭隘而局促的生活天地所带给他们的信仰理念和平安吉祥的希望，是谁也无法超越的，谁也不能断送他们的希望。

除夕晚上祭祖，初一早晨贺拜。一是对逝者，一是对生者。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祭祖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程序，表示追念先祖先人的艰难创业和高尚品德。贺拜也是家家户户不能少的礼仪。中国是个家族伦理社会，向长辈贺拜和向平辈致意，表示对家族秩序的认同和遵从。向邻里朋友贺拜和问候，表示团结、和睦、友善、祝福的意愿。这个传统，在今天，也是我们要坚守的。

我国是一个幅员广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春节的民俗和风尚，不同地区自然也略有差异。各地春节的民俗风尚色彩斑斓，不仅是地域文化的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化多样性的表征之一。南方的，如鲁迅在《祝福》里描写的绍兴城里鲁四老爷家过春节：张灯结彩，祭祖仪式，以及在鞭炮声中辞旧岁迎新年的场面，那是清末民初江南一带人家过年时的情景。茅盾在《香市》里描写的家乡乌镇的香市，四乡的农民摇着赤膊船，成群结伙、摩肩擦背地来到社庙前，赶香市，有的背着香袋，有的挎着香篮，带着香烛。他们先到社庙里拜菩萨，再到水潭里汰“香手”。那些茶棚，戏法场，弄缸弄盆，走绳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线戏，髦儿戏，西洋镜，百草

梨膏糖，花纸，各式各样的泥的金属的玩具，灿如繁星的“烛山”，薰得眼睛流泪的檀香烟，木拜垫上成排的磕头者。北方的，像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的荣宁二府除夕前打扫房屋，更换门神、对联和重油桃符，使门庭焕然一新，以及新年放花炮的欢乐气氛，那是旧时富家豪门过春节的大致情况。老舍在《北京的春节》里写的则是普通北京市民过春节的景象和老北京人的心理。他说，腊八那天人家和寺观里熬制和分赠腊八粥，“这种特制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细一想，它倒是农业社会的一种自傲的表现”。中国的春节，色彩缤纷，风俗各异，而它的文化指向却是一样的：平安吉祥。

春节的文化意蕴，除了我们今天所感受到的以外，古人还曾赋予它一些其它的深厚而广泛的意涵，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逐渐被遗忘了，有些被遮蔽了。譬如，周天子在元日这一天要祈谷于上帝，要扛着锄头到田地里耕作，因为立春之日东风解冻，后五日，蚕虫始振，再后五日，鱼上冰，五谷开始发芽生长了。还要祭祀社稷，向农神祈愿。农神是哪一位呢？相传是句芒。又譬如，《史记·天官书》里说：“凡候岁美恶，谨候岁始。”《正义》云：“以四时之日，候岁吉凶也。”所谓“候岁美恶”、“候岁吉凶”，是说如果正月且晴天，预示着来年一年丰收。古代有“正月且决八风”之说，即：如果风从南方来，预示着一年大旱；风从西方来，预示着一年中将会有兵祸；风从东南来，预示着“民有疾疫”，是岁恶；等等。针对着这一系列文化涵义，人们又制定出了一系列的对策。譬如元旦（春节）这一天，“先于庭前爆竹……贴画鸡户上，悬苇帚于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宗懔《荆楚岁时记》）。在这一天还要悬羊磔鸡，以压疠气。也逐渐形成了一些节日风俗，如周处《风土记》里记载的拜年之俗：“元日，长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贺。”《列子》里记载的放生之俗：“邯郸之民，以正月且献鸡于简子，简子厚赏之。”这种合乎环保理念的放生活动，在邯郸衍而为春节之俗。这一系列有关春节的文化意涵，所显示的，是浓重的农耕文明的色彩。属于物候的，应当是古人科学观察的总结；而属于巫术的或禁忌的，当可供认识和梳理人类文化发展的轨迹。

庚寅年（2010）春节，在我国全球化、现代化、城镇化的脚步声中来临了。我们常说“新春佳节”；古人说“瞻芳节兮嘉时”！人生易老，岁月无情。尽管人生无法再回到童稚无邪的年月，关于春节的理念和春节的过法也已今非昔比，但春节所固有的那些或隐或显的意涵，却让我一次次地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永恒与鲜活。

作痛。但是想到明日即可见到他们，心里稍稍有点安慰。我终究还是不能放心他们，想打个电话给司机，却不敢拨号。枯坐在桌子前面，想象着坐在长途客车上的母亲，她肯定脸色苍白，头发蓬乱。载着父母的那辆客车此时正穿越中国西南大地，玻璃窗外是冬日西南的风景，山坡、空荡荡的庄稼地、树木、河流……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着，公路两边的景物如幻灯一样不断地划拉了过去。不晕车的父亲在做什么呢？他除了要照顾晕车的母亲，还做什么呢？

载着父母的车此时该到哪里了？过南充，到重庆，然后是长寿、黔江、涪陵……每次回去我都是坐火车，要经过这些地方。整个下午，我都没有心思做事情，想象着载着父母的那辆客车，我在百度上搜索着；看看钟表，计算着他们该到哪里了。

直到半夜，我都没有睡好，想着父母明天就过来了，也担忧他们坐的这辆客车。母亲一辈子生活在农村，她有一个习惯，天黑便睡觉，一大早就起来，忙里忙外。从没有熬过夜的母亲是如何度过在长途客车上的这一晚。不知她有没有睡着，夜里会不会受凉，晕车是不是好了一点。窗外是繁华的东莞，而远在千里之外，有一辆载着父母的客车正在黑暗中穿过旷野、隧洞、桥梁……深冬的西南大地上，应该是一片萧瑟的风景，冷的山野，冷的收割后枯涩的大地，冷得河流蜷缩，冷得落叶树只剩枝条，常绿树也缩成一团，连天空的月亮都是冷的，悬挂在车窗外那边的山梁上，照耀着沉睡的大地。大西南的公路蜿蜒曲折，错落有致的村舍无声地向后退去，拥挤的客车上疲倦的旅客昏昏入睡。不知晕车的母亲此时如何。

父母离我越来越近了，过了贵州、湖南、广西，进入广东境内了。下午四点，打电话问司机，答七点到；再问是否到常平车站，答肯定。在外多年，经常听说长途客车种种不是，把乘客扔在路口，或者根本不经过乘客要到的地方，中途倒卖等，终究不放心。父母初来广东，又问了几句，司机答复是肯定的。六点

迎虎年 祝新春

牛年将要终了，虎年来临。过去的一年，我们与世界上各国、各个民族的人民一道，经历了严酷的金融风暴的侵袭，经历了此起彼伏的自然灾祸，聆听着深陷恐怖、战乱的西亚地区的枪声，关注着自己土地上的人和事，紧张忙碌、奔波往还。但在心中，我们坚守着质朴的信念：冰霜终将消融。虎年的虎虎生气，已然温暖了我们的心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在坚守中勇敢前行，创造着美好，担当着未来。祝福虎年，众生吉祥、安康。

——编者



▲吉祥虎(纸本彩绘) 吴晓军 作



▲虎娃(泥·彩塑) 杨志忠 作



钟，在老家的舅舅打电话问是不是安全到达。我再问舅舅客车发往哪里，得知客车终点站并非东莞，而是深圳，我又不放心了，这车肯定不到常平车站。但是舅舅在电话那端肯定地说，司机说一定到常平车站之类，我不再说话。只有打电话给司机，司机说要八九点才能到东莞，电话中他不再提常平，而父母肯定不知这辆把他们扔在哪里。我暗自埋怨父母为什么不坐火车，这样夜晚把他们扔在陌生的路口，会不会有什么意外。

直到七点，司机才说他们只能在黄江高速路口下车，大约8点半左右才能到那里。黄江高速路口在哪里，我不知道。虽然来了东莞8年，我对东莞的印象依然很模糊，东莞这几年变化太大了，这座只有100多万户籍人口的城市，却有着1000多万如同我一样来这里打工寻梦的外来者，他们中绝大部分的人都留在这个城市过年。

面包车，司机是广西人。他知道黄江高速路口在何处。离我住的常平大约40多分钟的路程，不是很远，可是天已经黑了，不知父母如何。倒是这位广西司机不断地安慰我，说他经常去那里接人，没有关系。交谈中，得知他来东莞11年，过年也不回家，留在东莞过年。

天黑了，整个城市灯火辉煌，霓虹流光溢彩。坐在车上看

父母在车上

□郑小琼

出来多年，很少回四川过年。每年年三十那天打电话回家，母亲总在电话那端叹息，好些年家里人都没有聚在一起过年了。今年弟媳在广东生小孩，父母来广东过年。

父亲在贵州，母亲在老家，弟弟、弟媳和我则在广东东莞打工。母亲很少出乡，父亲也没有来过广东。确定好父母来广东过年已有一月之余。在这一个月，母亲几乎天天打电话过来，问广东的天气，要坐多久的车，坐火车还是汽车，然后担心房子没人照着。她犹豫不决地唠叨着。虽然这样，从母亲的声音依然能感觉得到高兴，她每次在挂断电话前，总会不经意地说一句“一家人总算可以聚在一起过年了”。

父亲从贵州提前赶回四川，原本坐火车。后来见母亲准备了太多的东西，决定坐长途汽车来广东。车从南充出发，司机说会过我待的常平镇，到时去车站接他们就行了。

舅舅把父母送上车，然后便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上车了，大约第二天晚上六七点便可到常平。舅舅又在电话里把长途客车的车牌号、司机的电话等等都告诉了我，嘱咐我，一定要到常平汽车站接父母；末了，又叮嘱我，他们到了就报个平安。他再三嘱咐，很是仔细。坐在车上的母亲从舅舅的手中接过电话，又把话重复地说了一遍，她还是有点不放心，怕我听错。其实我早已记好。况且，长途汽车还是不过常平，我还不肯肯定。出来这么多年，早已见惯了，但是怕母亲放心不下，还是附和着她。母亲在电话那端说了好几次，直到快开车时，才把电话挂上。电话这端，我说我会提前打司机的电话，让母亲宽心。

我在计算着父母的行程，这是母亲第一次出远门，她又晕车，要坐这么久的车，不知她会呕吐成什么样子。我心里隐隐